

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人口政策

王 颖 佟 健 蒋正华

【内容摘要】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人口机会窗口,但人口机会窗口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转化为人口红利。与增加人口数量相比,提高人口素质、充分开发各年龄层次的人力资源、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则是我国经济增长更有效、更持久、可持续的人口动力和源泉。一些学者基于我国人口红利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只有保持大量廉价劳动力才能保证发展,因此必须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政策建议,显然没有认清严峻的人口形势,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背离了我国人口发展战略。文章认为,从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出发,不断完善人口政策是必须的,但这与人口红利无关。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劳动力;人口素质;科学发展观

【作者简介】王颖,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佟健,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蒋正华,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Demographic Dividend, Economic Growth and Population Policies

WangYing Tong Jian Jiang Zhenghua

Abstract China has had and will continue to have population opportunity window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but only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it could be converted into demographic dividend. Compared to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quantity, it will be more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by improving population quality,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 at all ages and participating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The belief that China could only sustain its development by maintaining a large and cheap labor force and therefore China's birth rate should be increased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serious population situation in China and is detrimental to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ition. Adjusting population policy is essential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bu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Keywords Demographic Dividend, Economic Growth, Labor Force, Population Quality

Author Wang Y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Email: xjtwy@sina.com; Tong Jian is from 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 Zhenghua is Former Vice Chief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ommittee.

1 引言

根据搜狐新闻网 2010年“两会”提案议案关注榜的统计¹,人口政策调整的提案议案受关注度位居总排行榜第六位,人口生育政策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社会各界对未来人口生育政策的走向有各种猜测。一些机构和学者对我国人口红利进行了研究²,认为劳动力充裕,价格便宜,由此产生的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因素,但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将在 5~10年后消失,从而失去劳动力方面的竞争优势,减缓中国经济增长。因此,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迫在眉睫,应通过提高人口出生率来保证劳动力供给,保持劳动力竞争优势,达到为经济增长提供更有效、更科学、可持续人口动力和源泉。能否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口红利?所谓的“人口红利期”结束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将失去动力?基于人口红利分析得出的人口生育政策建议是否科学?是否存在比增加人口数量更有效、更科学、可持续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动力和源泉?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均需作深入的分析,以取得更加全面的认识,从而避免人口红利观念盲目扩大对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误导。

2 人口红利理论

2.1 人口红利的内涵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David E. Bloom等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礼物或红利³。此后,David E. Bloom等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⁴。国内学者也对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所谓人口红利做了不少研究,但迄今为止,关于所谓人口红利的定义仍是众说纷纭。《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7)》指出:“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依次形成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⁵。尽管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人口红利的看法不尽相同,但都认同人口红利包含两大基本要素:一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二是抚养负担相对较轻⁶。

2.2 实现人口红利的条件

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人口负担系数比较低的局面,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人口的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这段时期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 Opportunity Window)。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期间,即是在潜在的人口红利期,其人口有如下三个特征为经济增长提供机遇: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就业充分,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人口红利中所描述的“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实际上指的是“人口机会窗口”,只

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转化为额外的经济成果,从而获取真正的人口红利。

抓住人口窗口机会,充分实现人口红利,首先要具备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政策、制度支持。在劳动力的运行方面则有五个要素:第一,劳动力资源被充分利用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如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年龄人口不能真正参与生产,那么人口红利就难于兑现,社会也将承受巨大的就业压力。严重超过经济总量需要的劳动人口规模反而会减少“人口红利”,缩短“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窗口期也有可能成为“人口陷阱”。因此,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²。第二,有效的劳动力配置制度是利用人口红利的保障。王丰、安德鲁·梅森认为人口转变只是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的前提是政策制度支持⁷。其中,最主要的是提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的制度保障。第三,劳动力本身要有意愿参与劳动,劳动参与率应该保持在较高水平。第四,人口红利的大小受劳动人口素质制约。较高的劳动力人口素质,能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人口红利。第五,人口红利还取决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没有足够的资源作为支撑,像土地、水源以及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动力的缺乏,“人口机会窗口”就不可能通过生产和服务过程转变为“人口红利”⁸。

3 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3.1 中国获取人口红利的条件

我国人口机会窗口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更好地转化为人口红利。就我国取得人口红利的条件来看,受到了如下因素的制约:第一,巨大的就业压力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这意味着大量人口实际上未能有效参与生产,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2010年5月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变动趋势及判断》报告指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3年、2021年均达到9.26亿的双峰,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2400万,按城市化率计算,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就业人口年均净增1000万⁹。第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系和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制度,当地劳动者和外地劳动者同工不同酬,用户籍限制外来劳动力就业范围,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与户籍挂钩等,造成很大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实际上未能对经济增长贡献人口红利。第三,个人有参与劳动的意愿,劳动参与率应该稳定在较高水平。由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和某些福利制度的刺激,相当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不愿参加工作,这也是充分实现人口红利的限制性因素。第四,我国人口素质偏低严重制约了人口红利的实现。我国每年约有20~30万肉眼可见先天畸形儿出生,各类不健康人群规模巨大,每百万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研究人员数相对较少,人口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亟待提高。第五,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环境承载能力弱、资源相对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仍是发展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口红利的较好实现。

从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来看,其“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2001~2002年竟连续两年为负增长,年增长率分别为-0.3%和-0.5%¹⁰。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¹¹。另外,“四小龙”所指的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都是人口规模很小的经济体,1950年新加坡的人口为240万、韩国人口为3800万、香港人口500万、台湾人口1787万。新加坡和香港的人口还不足北京市人口的1/3,台湾人口比北京市人口略多,韩国人口不到广

东省人口的一半。把这么小的区域的经济崛起归功于人口转变是没有说服力的¹²。

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人口机会窗口,但人口红利的实现受到了各种条件的制约。因此,我国人口机会窗口仅仅是给实现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可能的机遇,人口机会窗口并不等于人口红利。当然,不具备机会窗口条件的人口也有各自的优势,充分发挥优势同样可以取得其他形式的“红利”。

3.2 人口红利基本要素与经济增长关系

人口红利包含两大基本要素:一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二是抚养负担相对较轻。考察其两大基本要素与经济增长关系,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2.1 劳动力的数量、比例与经济增长

就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综合性的,资本、劳动、技术进步、企业家才能和制度等因素均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只是在某些特定时期某些因素会起更重要的作用。因此,究竟是什么要素决定经济增长,哪些要素起着根本性作用,要做具体分析。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有很多不同的研究结果。蔡昉等人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口红利,其中,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¹³。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李善同的研究,改革以来的1978~2003年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0.6%,而且分阶段看这种贡献率是逐步下降的,由1978~1985年的12.9%下降到1990~2003年的4.5%;远远低于资本贡献率63%,技术进步等因素贡献率26.2%¹⁴。王文举等对2002~2005年全国经济增长因素分解的结果为,资本贡献率72.44%,劳动贡献率7.79%,市场化改革贡献率14.22%,技术进步贡献率5.55%¹⁵。这些研究均说明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增长的贡献率是比较低的。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劳动指劳动力,劳动力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劳动力质量对数量有很强的替代性,而数量对质量的替代性较弱甚至根本没有。另外,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¹⁶,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个国家最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资源应该出口,最缺乏的生产资源应该进口。最典型案例是,历史上英法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中,英国出口的是工业品,从法国进口农产品;法国出口的是农产品,从英国进口工业品。但里昂惕夫研究了美国的外贸结构后发现,资本实力最雄厚的美国,出口的反而是劳动密集型商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悖论,其实是因为美国劳动力的效率和素质比其他国家高4倍左右,所以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有竞争力的。经济增长理论和“里昂惕夫之谜”均说明了劳动力素质比劳动力数量更重要,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3.2.2 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

总抚养比是指被抚养的老年人口和少年儿童人口数量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比,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负担的轻重。根据2007《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数据,2006年,全国总抚养比低的吉林省(27.2%),其劳动年龄组人数比例高、老年和儿童人数比例低,但经济发展水平仅处于全国中游地位,人均GDP为全国第十三位,黑龙江、辽宁和内蒙古与吉林的情况十分相似。然而,经济发展较快的广东省,人均GDP为全国第六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江苏,但总抚养比居全国中游,劳动年龄组人数比例相对低、老年和儿童人数比例高,2003年曾为全国最高(52.9%),江苏也类似。日本低抚养比与“经济高速增长期”也不一致。从日本的抚养比和经济增长率比较来看,1960~1970年日本的年均GDP增长率为9.4%,总抚养比平均为49.1%;1970~1980年日本的年均GDP增长率为4.5%,总抚养比均值为47.1%;1990~2000年日本的年均GDP增长率为

1.5%, 抚养比均值为49%。20世纪70年代的抚养比略低于60年代的抚养比,但是经济增长率却下降了一半以上;90年代的抚养比与60年代相当,但是经济却陷于停滞¹⁷。以上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呈弱相关性和弱因果性¹⁰。不可否认,人口红利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发展,但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受到了各种条件的制约。通过对人口红利两大基本要素与经济增长的考察,得出它们之间并无显著关系。

4 新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人口动力和源泉

立足于我国“人口总量过多、资源缺乏、生态环境承受沉重压力”的基本国情,并着眼于未来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人口方面,与增加人口数量相比,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充分开发各年龄层次的人力资源、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则是我国经济增长更有效、更科学、可持续的人口动力和源泉。

4.1 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实现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人口素质偏低。多年来国家在加强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力量,中国人口素质已有显著的提高。现在中国每10万人受教育的人数已超过了印度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但是从事开发和研究人员占总人口比例仍很低,每千人中只有0.5个,与日本的5.1个相比,差距很大。当然,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人力结构性差别将会存在,但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比例仍然有待大幅度提高。在建设知识型、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时,这种需求显得更加强烈。从世界经济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经验看,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都要快于经济追赶速度,从19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资料来看,两类地区相比,教育水平对经济发展的超前量约为20~25个百分点。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大幅度提高,各地区死亡率均在5‰~7‰之间,相差不大,但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却相去较远,高素质人才的分布更不均衡,人才结构也与实际需求有一定差距,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部分大学生就业难和部分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并存的现象就是一个例证¹⁸。因此,我们要树立人才资源第一的观念,把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实施人口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一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二是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三是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体系;四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全国受教育水平;五是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

4.2 充分开发劳动年龄人口人力资源

有了高素质人力资源还不够,必须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使广大劳动年龄人口都能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第一,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推进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网络化、体系化和法制化,在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同时,有效保障劳动力合法权益,规范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促进劳动力通过市场实现就业。第二,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努力促进就业。第三,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1.5~1.7亿人,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将持续存在。按人口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测算,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⁵,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4.3 实行积极老龄化战略,努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普遍的趋势。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众多老年人口闲置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力资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老化,老年人赡养系数增加,总供养系数上升,国家用于老年人的支出增多,有储蓄能力的人口及储蓄额减少等不利影响。2002年4月在马德里

召开的联合国世界老龄大会就提出了面向新世纪的积极老龄化战略——《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其主要精神有两点：一是老年人不是社会的包袱，而是全社会、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同时还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二是倡导老年人自身要以积极的、健康的姿态参与社会发展。积极老龄化是老龄观的一个革命性变革¹⁹，它把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权利重新还给老年人。这就使得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压力转变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积极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尤其是城镇知识型老年人力资源，充分发挥老年人才的社会作用，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与增长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途径。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一是要树立“积极老龄化”观念，积极营造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二是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三是条件成熟时，尝试推行适当的弹性退休制度或推迟退休年龄；四是开拓老年劳动力市场，优化老年人力资源配置。

4.4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和世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赢。经济全球化带来劳动力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有效促进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随着未来经济发展，我国在引进高技术企业和人才的同时，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企业也将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将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会改善中国劳动力结构。

5 认清人口形势，避免人口红利的观点误导我国人口政策

我国人口总量的压力依然长期存在。即使稳定在低生育水平，中国劳动力数量到21世纪30~50年代仍将保持在8亿至10亿之间，每年出生的人口数量也将保持在1300万至1600万之间¹⁸。我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15亿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庞大，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6年将达到峰值10.1亿人，比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还要多⁵。2008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55亿，“十二五”期间将净增2449万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不会缺少劳动力，但是考虑到素质、技能等因素，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还将长期存在。人口总量过多、资源缺乏、生态环境承受严重压力仍是我国发展的主要障碍。

鉴于以上分析，对我国人口红利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决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口红利期的关闭就阻碍了经济发展，从而忘记了我国人口多、土地少、资源相对缺乏这个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我国新时期人口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制度创新，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实现人口大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⁵。不断完善人口政策的实施，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因时、因地调整、出台适当的措施，使之更加适应建设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2010年“两会”提案议案关注榜. <http://news.sohu.com/s2010/1138/s270549935/>
The Billboard of Attention about Proposal & Motion in NPC & CPPCC, 2010 <http://news.sohu.com/s2010/1138/s270549935/>
- 2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研究, 2004; 2: 3~7
Cai Fang. 2004.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Dividend and Sustain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Research 2: 3-7.
- 3 David E. Bloom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1998.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2: 16-25.

- 4 David E. Bloom, David Canning and Jaypee Sevilla 2003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RAND* 56-78
- 5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7: 23~26
Research Group of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2007. Report on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3-26
- 6 钟水映, 李魁.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人口与经济*, 2009(2): 56~57
Zhong Shuiying and Li Kui. 2009. Literature Review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 Economics* 2: 56-57.
- 7 王丰, 安德鲁·梅森.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 *中国人口科学*, 2006(3): 14~16
Wang Feng and Andrew Mason. 2006. Demographic Factors of Chin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3: 14-16
- 8 叶文振. 客观看待“人口红利”现象. *福建日报*, 2007-10-30
Ye Wen zhen. 2007.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Fujian Daily*, October 30
- 9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中国劳动力变动趋势及判断. 北京: 中国人口与发展咨询会论文集, 2010: 78~87
Project Group of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0. Trends and Assessment of Changes in China's Labor Force. Beijing: Collected Papers of Consulta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78-87.
- 10 穆光宗. 中国的人口红利: 反思与展望.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38): 38~42
Mu Guangzong. 2008.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Reconsideration and Prospect.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8: 38-42
- 11 尹文耀. 简论人口效应与人口“红利”.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7(4): 25~32
Yin Wen yao. 2007. On the Demographic Effect and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Market & Demographic Analysis* 4: 25-32
- 12 周祝平. 人口红利、刘易斯转折点与经济增长. *中国图书评论*, 2007(9): 7~18
Zhou Zhuping. 2007. Demographic Dividend,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Economic Growth. *China Book Review* 9: 7-18
- 13 蔡昉. 人口红利仍有潜力可控. <http://finance.jrj.com.cn/people/2010/01/1615236818835.shtml>
Cai Fang. 2010. Potential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http://finance.jrj.com.cn/people/2010/01/1615236818835.shtml>
- 14 孙自铎. 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 ——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 *经济学家*, 2008(1): 17~21
Sun Ziduo. 2008. Has China Entere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Yes? Demographic Dividend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st* 1: 17-21.
- 15 王文举, 范合君. 我国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中国工业经济*, 2007(9): 8~11
Wang Wenju and Fan Hejun. 2007.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ntribution of China's Marketization to Economy Growth.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9: 8-11.
- 16 王培志. *国际经济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Wang Peizhi. 2007.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eijing: Science Press
- 17 黄润龙. “人口红利”质疑: 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现代经济探讨*, 2009(8): 16~22
Huang Runlong. 2009. Question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Exagger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Modern Economic Research* 8: 16-22
- 18 蒋正华. 新时期人口政策思考. *中国人口科学*, 2006(6): 4~6
Jiang Zhenghua. 2006. Thinking of Population Policies in New Period.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6: 4-6
- 19 中国老年学学会. 走向积极的老龄化社会.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03: 103~123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2003. Towards An Active Aging Society. Beijing: Hualing Press: 103-123

(责任编辑: 沈 铭 收稿时间: 2010-06)